

热点追踪

我国企业具有较强
数字化服务支撑力

科技日报讯(记者付丽丽)在8月上旬举行的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大会暨2023(第八届)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上,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023中国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研究报告》。

研究分析了截至2023年6月A股、港股及在美上市的中国数字化服务企业共计1353家,结合主营业务结构、营收等条件筛选企业534家,从经营能力、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创新能力、数字化产品力、数字化服务支撑力这5个一级指标,以及15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研究显示,2023中国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表现突出的企业有76家分布在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其中53家企业总部位于北京。企业总营收达8407.32亿元,其中19家企业年营收能力在100亿元以上,占100家企业总营收的58.3%。企业在数字化服务支撑力方面普遍发展良好,基本形成服务支撑网络,其中3家企业在全国拥有近百家分支机构。数字化基础能力与创新能力方面,40家企业数字化基础能力突出,59家企业核心技术人员占比过半,22家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高于30%。

研究将表现突出的企业分为三类。其中一类企业16家,数字化综合服务能力突出,业务基础良好,服务类型综合性强,业务领域覆盖完整,能够紧密围绕自主技术创新开展高价值研究,占据数字化服务价值链制高点。二类企业32家,企业聚焦行业领域深耕数字化服务价值制高点。三类企业52家,企业定位服务细分领域数字化转型,聚焦诸如数字地图、数字消费等具体应用场景,多为新兴技术和应用领域高成长性企业。

研究建议,要通过政策引导充分激活数字化转型需求市场,以更多实践机会带动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实现整体提升;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变跟随式创新为引领性、革命性创新;以质量树立品牌,建立数字化服务质量体系,推动数字化全产业链质量传递,重点布局制造业“数智”应用与品牌建设。

技术进步推动
语言生活发生深刻变化

科技日报讯(记者孙明源)8月16日上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在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语言生活的发展状况。发布会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日培表示,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我国语言生活发生深刻变化。

张日培举例说,近期广受关注的生成式语言模型展现了科技和语言的深刻联系,智能语音产品在儿童语言教育当中崭露头角,智能写作走进日常生活,手语数字人服务特殊群体成效显著。学界正在密切关注智能技术给我国语言生活带来的新变化。

目前,“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已经汇聚了8000余项学习资源并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升级上线,“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启动建设,“语言服务助力数字中国”倡议得到了各界的热烈响应。

发布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王晖表示,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在持续构建“数字+资源+服务”集成的语用大平台,改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平台,完善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网站,升级扩容中华经典资源库系统,并重点打造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今年7月,语博App移动端已经上线,并且接入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长江水资源
调度管理实施细则出台

新华社讯(记者李思远 田中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近日印发实施《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调度管理实施细则》。这是2021年11月水利部出台《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以来,流域管理机构出台的第一个水资源调度管理方面的流域规范性文件,对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规范调度行为、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细则共5章38条,包括总则、调度方案与计划、调度实施、监督管理、附则等。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调度方案和年度调度计划编制及审批要求,细化了年度调度计划、月(旬)调度计划、实时调度指令相结合的调度方式,规定了水资源调度实施分级管理权限,完善了优化调度、应急调度、生态调度、调度预警及处置、水资源监测及信息共享等工作内容,增强了流域水资源调度工作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细则在总结和梳理流域水资源调度工作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利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办法(试行)》《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长江流域实际,对水资源调度管理要求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将更加科学指导流域各级水资源调度部门(单位)规范和加强水资源调度管理工作。



一艘艘运输生产生活物资的船舶在长江航道上有序行驶。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让低级别文物也能得到文保“特别关照”

◎本报记者 韩荣

“这座关帝庙始建于宋代,现正殿为清代遗构,建筑受力构件明确,插廊结构搭建合理,室内空间处理极具特色,但目前建筑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损,再不抢救就真成遗址了……”8月16日,记者走进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干了32年文旅工作的沁源县文旅发展中心主任郭天红对全县受损亟待修缮的文物如数家珍。这些文物大多是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

日前,国家文物局官网发布了《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准备工作的通知》,提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3年将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透露,2023年还将筹备启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统筹做好各级各类文物资源特别是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加强文物保护单位工程监督管理,实施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石窟石刻、文物建筑重大保护项目。

低级别文物如何确定?它们又为何得到“特别关照”?

不可移动文物都应予以保护

所谓低级别文物,是相比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高级别文物而言的。

我国将文物一般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主要指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和石窟寺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十三条,可将不可移动文物按其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等分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等三个级别。

同时该条也明确规定,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公布。也就是说,包括无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在内的所有不可移动文物都应按照文物予以保护。

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认为,低级别文物主要包括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低级别文物在不可移动文物总数中占比很大,呈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分布零散、保存状况差等特点。

在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炜林看来,所谓的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并不一定都不重要。其中一些遗址是因为

过去根本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缺乏对其所蕴含价值的认识而被忽视。低级别文物中其实大有宝藏。

“我在陕西时曾经主持过对高陵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工作,这个遗址曾经是个典型的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无人问津。”王炜林回忆,2004年,因一个基本建设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对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进行发掘,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逐渐认识到,这个遗址不仅是陕西的,甚至为全国最大的庙底沟文化遗址。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该项考古工作解决了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和墓葬两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这项工作因此获评2008年和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杨官寨遗址的身份也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改变,由无级别单位一跃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不是所有的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都能像杨官寨遗址这样幸运,它们中的大部分因为保护级别可能被忽视,甚至被无视。”王炜林指出,尤其是分布在城市及其周边的这些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可能因为土地开发而“命运”堪忧。

多重因素影响合理利用

数据显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登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处。截至目前,全国已核定公布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核定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4629处。

“全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保守估计在70万处以上。”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山西是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省。在山西省5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占据绝大多数,但由于文物“家底丰厚”,很多县级文保单位虽然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也只能“屈尊”于低级别文物。这些遗存的不可移动文物多暴露于室外环境中。长期以来,这部分文物由于关注度不够、投入保障不足、管理不到位等因素,约有80%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保存状况堪忧,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保护。

在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看来,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目前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保存状况堪忧;二是保护经费缺口较大;三是低级别文物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对此,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文旅局副局长李军军表示赞同。他坦言,目前低级别文物保护依然问题突出,保护任务繁重、管护力量不足、产权问题复杂、合理利用滞后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多数低级别文保单位处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本身

规模小,缺乏旅游开发价值,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文物的合理利用。”李军说。

为低级别文物“遮风挡雨”

低级别文物,既是历史文物,也是乡愁记忆。

近年来,低级别文物保护已经逐渐引起了重视。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举例,从2023年起,山西省实施了濒危文物抢救性数字化保护,山西省财政每年单列20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开展“山西省古建筑彩塑壁画抢救性数字化保护项目”。

“项目一期目标为长治市和晋城市的63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包括41处低级别文物,计划采集单体建筑236座、壁画2537平方米、彩塑30尊的数据信息,建立文物数字化信息保全档案,为后期文物保护利用提供支撑。”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说。

除此以外,2022年底山西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联合发文,鼓励市、县(市、区)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全面保护。截至今年6月底,山西省已安排低级别文物政府一般债券2.7亿余元。

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如何推动低级别文物保护,提升社会对此类文物的保护意识?

不少专家表示,建议适度提高国保资金可用于省级及省级以下文保项目比例,强化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提高资金执行效率。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公益基金、全额出资、与政府合作等方式,参与低级别文物建筑本体保护修缮、历史风貌维护、旅游文创开发、文化传承发展等保护利用全过程。

此外,专家还建议,在人员队伍结构上不断优化,提升文物管护和科研能力,夯实基层文物保护力量。建立线上监管线下巡查机制,实现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监管全覆盖,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同时,组织开展低级别文物灾害因素分析评估、保护材料及工艺研究和病害成因及治理等技术攻关,研发文物建筑防雨雪等保护装备,开展重要濒危文物数字化采集,真正实现为低级别文物古建“遮风挡雨”。

“相信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会得到一定的提高,包括所谓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在内的所有不可移动文物都会得到有效保护,逐渐走向文物保护的舞台中央。”王炜林说。

市场趋近饱和、责任判定缺乏依据

网约车呼吁完善行业法规

◎实习记者 周思同

我国的网约车行业已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它在为乘客带来便利的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浮现。

今年以来,三亚、珠海、济南、遂宁等城市先后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风险预警的通告,提醒大众该市网约车数量已趋近饱和,行业景气情况逼近警戒红线。7月21日,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宣布,自2023年7月22日零时起,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能力核查业务;自2023年9月20日零时起,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业务(新增)。这一

消息再度指向了网约车行业内部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8月上旬,科技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业内人士进行了采访。

平台发放补贴不能起到
根本作用

“作为一名网约车行业从业人员,近几年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价格内卷。”就职于某网约车平台合作运营商的田园表示,由于从业者人数增加,行业内部正面临“狼多肉少”的问题。为了争取乘客,主流的网约车平台不得不打价格战,以比其他平台更低的价格吸引乘客,甚至出现了一个距离

近三公里的单人网约车订单只收三块钱的现象,价格比同距离的公交车还要低。

田园告诉记者,价格内卷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但司机收入降低,也会损害新的从业者的加入意愿,从而影响到平台乃至行业的发展。“因为订单价格过低,许多平台司机不愿意提供服务。部分司机甚至采取激进手段抵制平台订单降价,这类事件对行业氛围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了缓解这一类问题,许多网约车平台也推出了针对司机的补贴计划,由平台出资为司机提供额外的订单补助,以提高司机收入。但田园认为,这一类举措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因为整体市场已经趋近饱和,即使平台发放补贴,也只能短暂地从其他平台吸引司机和乘客。一旦平台停止‘烧钱’,乘客可能就会选择更便宜的平台。”

除此以外,行业内部的乱象也是造成平台补助无法持续的原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子渊表示:“现在很多网约车司机做‘僵尸号’,通过打‘虚拟单’去骗取平台的补贴费用,尤其在上海、珠海、三亚等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这也是当前许多城市限制新的网约车人驻的原因。”

从源头上提升大众对行
业的信心

在被问及改善网约车行业现状的方

法时,田园和王子渊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合法化。

田园表示,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市场出现饱和现象在所难免。想要进一步提升行业从业者质量,稳定从业者收入水平,应当从源头入手,推行网约车司机职业化、网约车市场合法化。

除却司机合法化外,行业立法的完善也是工作的重点。王子渊表示,早在2016年,有关部门便已经出台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约车行业的经营管理做出了一系列规定。然而,当前网约车行业仅仅拥有一系列行政规章,而并无上位的行政法规。这导致在出现责任纠纷时,会出现无法判断责任主体的情况。

王子渊告诉记者,现今行业内的许多纠纷,如“僵尸单”、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交通事故,以及平台自身的经营等问题,在民法典中并没有相对应的规定。在进行司法判定时,裁判文书缺少可以直接引用的源头。这也是网约车作为新兴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上位法的制定,可以明确司机和平台的法律关系,使责任的判定更加公平。这种合法化不仅是针对某几个平台,而是针对整个行业。完善行业法规,做到让每个平台和从业者在遇事时有法可依,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提升大众对行业的信心。”王子渊说。



在某地停车场上,停满了崭新的网约车。